

►► 阅读更多全媒体形态报道请扫描二维码下载新华社客户端, 订阅“新华全媒头条”栏目



一间茅屋一老马，硬汉 30 年守护万亩林

记辽宁彰武章古台阿尔乡林场护林员李东魁



这是科尔沁沙漠南端和彰武县章古台固沙林场接壤处的航拍图(2016年5月26日摄)。新华社记者姚剑锋摄

据新华社沈阳1月10日电(记者于力、彭卓、张逸飞)章古台上,松涛阵阵,人语鸟鸣。一林之隔,沙幕肆虐,蓄势进犯。几公里外,是上世纪50年代被专家预测“被沙漠吞没”的辽西北彰武县。如今,这个本应“消失”的关外小城依然屹立,“楼兰古城”的悲剧命运并未重演。

在这条与沙搏斗、根植绿色的道路上,一抹身影始终在前行。这位忠实的护林员,以30年的寂寞,守护着松林蓝天。

半生寂寥：一间茅屋，一匹老马，一方硬汉守护万亩松林

捧着军水壶,身背一把砍柴刀,骑行一匹枣红马。对于护林员李东魁,辽宁省彰武县章古台林场阿尔乡护林点,是拼搏近一生的战场。

章古台林场位于辽宁省西北部,地处科尔沁沙漠东南风口,与漫天黄沙毗邻。彰武县20世纪以来,“无风沙三尺,有风沙一丈”,每年20多次、大于5米/秒的风沙遮天蔽日,掩埋人迹。

上世纪50年代,这个曾经水草丰美、人丁兴旺的关外府镇,被治沙专家判了“死刑”——彰武县不适宜人类居住,辽西北边境小城应整体搬迁。为加固科尔沁风沙南侵的屏障,1987年从部队复员退伍的李东魁,被分配到章古台林场阿尔乡护林点做护林员。在这个四处都是沙地子地,不通电、不供水的大风口,护林点起初是一处地窖,没有油毡纸和石棉瓦,房顶只盖着一块彩条布。林区远隔人烟,冬季大雪封山几个月都见不到人影,几乎与世隔绝。

艰难的生存环境,吓退了同批分配的3名护林员。只有倔强的李东魁咬着牙,留了下来。

“我也曾经动摇过,行李都收拾好了,可临走时又打消了念头,一股耻辱感也涌了上来。”李东魁说:“士兵逃离自己的阵地,这不是逃兵的行为吗?”李东魁从小在这片沙地上长大,对当年沙进人退的场景记忆犹新。“我的父亲也曾是一名林场工人,也曾与风沙殊死搏斗。我有责任保护这片樟子松林不受任何侵犯!”

就这样,他一个人巡逻,一个人挑水,一个人做饭,与马为伴、与林为伍,以山为家,在山上盖起茅屋,打下水井、踱步林间,犹如深扎沙地的樟子松,在荒凉之地默默坚守。

时光如梭,陪在身边的老马已经换了一匹又一匹,安家山林的李东魁却始终如一:每天至少巡山13个小时,防火期遇到大风天气,则24小时不眠值守。累了,就靠在树下打个盹;饿了,掏出干粮就凉水吃几口;闷了,就站在沙粒子上喊几声,唱一唱记忆里那些深入骨髓的军歌。在他的守护下,30年来,护林场从未发生过一起火灾,近万亩郁郁葱葱的樟子松林,成为阻沙南侵的天然屏障。

由于经济困难,林场对护林员以耕地替发工资。中级职称的李东魁,分到32亩沙地,即使是好年景,一年的收成也不足八千元。“这个一心扑在林场的汉子,30年来从未有过休息日,连续十几年没有回家过团圆年,家里的几亩薄田全靠妻子照料,甚至女儿出嫁时都没能送亲,每逢万家灯火团圆时,独自站在旷野里的李东魁,心中满是对父母妻儿的愧疚。”

情有所寄：狼蛇盘踞、偷盗隐匿，持心中正戍御疾苦风霜

护林点方圆五公里荒无人烟,这片土地

上,却不只李东魁一个生灵。

曾经吓唬过“新人”李东魁的,是流浪狼群。每每入夜时分,凄厉的嚎叫声,在章古台上飘荡。护林场物资紧缺,每天定量一根蜡烛,只能提供至多两小时的火光,仅够满足做饭喂马、札记总结之用。燃尽之后,等待李东魁的是无尽的黑暗。装备不够,胆量凑。当过兵的李东魁仗着胆子大,每每狼群靠近,就跑到门口大吼几声,用嘹亮的军歌把野狼吓跑。与狼同行的,还有老鼠和蛇。“有一次我睡觉时掀开被子,感觉里面有两坨东西凉凉的,仔细一看竟然是两条蛇!”

对李东魁更大的挑战,是在他人的贪欲下守林护林。随着樟子松苗的市场价格上涨,有一些唯利是图者,就想从林场“偷一筐羹”,伺机盗取树苗、采摘松塔;还有一些村民也想染指国有林场,企图抢占一块地开荒,种庄稼“创收”。

只可惜,他们面对的是“认死理”的李东魁,“他把树看得比啥都重要”。

李东魁发现苗头后,加大巡山力度,挨家挨户宣传法律政策,游说村民守法守规。有不法分子企图贿赂他,和他“打商量”,被他严词拒绝。还有不服管的人,冲他嚷嚷“林子又不是你们家的”,李东魁正色道:“吃了老林家的饭,就是老林家人。国家财产谁也不许动!”

在李东魁的“监视”下,只要进了林场,不许抽烟、不许放牧、不许砍柴、不许挖沙取土。为此有人怀恨在心,半夜砸玻璃、水并堵沙子、两匹马被盗走……甚至有违规放牧的村民把李东魁打得头破血流,直接进了医院。

伤痛未愈的李东魁,握着一支破旧的钢笔,在日记中写道:“选择大山、选择森林,也就是选择了艰难,选择了无悔。但我很欣慰,从选择那一刻起,大山、森林就化为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。”



▲护林员李东魁在护林路上骑马前行(视频截图,2016年10月20日摄)。

新华社记者姚剑锋摄

泰若笃定：“朝圣”路上，行者之足并不孤独

李东魁常年“窝”在护林点,执拗的他对待亲友“回家过安生日子”的劝告无动于衷。家里的大小事,全落在了妻子王玉华的肩上:一手拉扯女儿长大,病榻床前侍候老人……“熬不下去”的妻子,一怒之下提出离婚。在岳父、亲友的劝说下,“心软”的妻子终于打消了离婚的念头,也索性把镇上的房子卖了,搬到山上陪李东魁一起守林,成了一名“不拿工资的护林员”。

妻子的到来,为护林工作增添了亲和力,也

感染了附近的村民:“人家为了护林,把家都搬来了,咱也能帮一把是一把吧!”如今,不少村民自发成为李东魁的“眼线”,一旦发现有吸烟、毁林,都会第一时间给李东魁打电话。

与“瀚海黄龙”的这场战斗,日持久、代际相传,几代彰武治沙人为此弃名舍利、苦心劳骨。

在这条战线上,先后涌现出多名“治沙英雄”:已逝的彰武县阿尔乡镇北甸子村“治沙书记”董福财,耗尽毕生心血奋勇治沙,直至生命最后一刻;30年钻研治沙之法的辽宁省固沙造林研究所首任党支部书记刘斌,创造性探索出移植樟子松人工治沙先例,填补了中国灌木治沙的空白;举债造林的四合城镇下河村个体户杨海清,22年承包荒沙3亩,个人治沙面积达1400亩……“彰武经验”还被西迁至甘肃天水地区,在祖国的西北地区复制着“彰武奇迹”。

就是这样一群不信心、不信命的汉子,向大自然发出不屈的呐喊。“斗沙”半个多世纪,彰武地区从曾经的黄沙遍地,变成如今的四野碧绿、松涛滚滚,一排排固沙林创造了奇迹:彰武县森林覆盖率达36.1%,树木蓄积492.64万立方米,平均风速由上世纪50年代的3.4米/秒降到1.9米/秒。这个曾经一只脚迈入戈壁的“黄沙村”,如今成为280多种动植物的栖息、繁衍绿地。

沙漠中有一种不起眼的植物,名叫“沙打旺”,风沙愈猛,枝叶愈脆,抓地愈牢。这些“死磕”黄沙的治沙人,就像那些倔强的“沙打旺”:纵然黄沙漫天,我自造林岿然。

凝视着眼前的“沙打旺”,李东魁悠然道出了自己最大的心愿:林校毕业的女儿,有朝一日可以接过治沙“接力棒”,成为爷爷和父亲之后的“林三代”。

一个人的“朝圣”,几代人的徐行。

斗“沙魔”：从“用力过猛”到“打七寸”

我国依靠精准发力、高效治沙,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治沙道路



▲拼版照片:左图为宁夏灵武市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,职工在扎草方格(2007年10月19日,新华社记者王鹏摄);右图为宁夏灵武市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,沙漠绿洲已经形成(2016年8月10日,新华社记者李然摄)。

新华社发

22%,为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创造良好生态条件。

2009年,国家林业局等七部门联合制定《省级政府防治沙目标责任书考核办法》,与沙区的各省级政府签下“军令状”,并且五年一签,考核结果成为影响干部升迁、去留的重要依据。

数字的巨变背后是人们力斗“沙魔”的不懈努力。几十年来,牛玉琴、石光银、石述柱、王有德……每一位治沙功臣的名字,都代表着一种精神,记录着人们战沙斗沙的壮举。

科学治沙,走出中国特色治沙路

依靠精准发力、高效治沙,中国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治沙道路。从大密度造林到量力而行,从“用力过猛”到“打蛇七寸”,中国治沙从粗放式逐步走向精细化。“原来习惯以大密度造林的方式来治沙,现在是通过低覆盖度治沙技术,以两行一带的方式恢复植被,充分考虑沙区水资源承载力,保证治沙成效。”国家林业局防治沙

沙办公室总工程师屠志方说。

宁夏针对不同区域采取不同治沙模式,在穿越腾格里沙漠的包兰铁路两侧建成卵石防风带、灌溉造林带、草障植物带、前阻沙带、封沙育草带组成的总面积6万亩的“五带一体”的防风固沙体系。

顶层设计不断完善,是中国治沙得以精准发力的根本保障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沙法》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防治沙工作的决定》《全国防治沙规划》等法律和规章制度相继出台。

科学技术是精准治沙的第一推动力。抗旱造林、固沙压沙等治理技术不断进步,极大地提高了治沙成效。据测算,一台固沙车每天可铺设草方格沙障4万平方米,固沙效率是人工的50倍,成本约为人工的三分之一。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通过用乔、灌、草结合,网、带、片相贯通的“三线”式造林,在茫茫戈壁荒漠上建成了一个渠路纵横、林带成网、粮蔬

茂盛的“沙海半岛”。

因地制宜发展沙产业,是沙区各地探索出的治沙新动力。青海将治沙和沙产业发展相结合,形成“东部种粮,西部枸杞,南部藏茶,河湟杂果”的发展格局。

发展沙产业,开启治沙新动能

沙区生存环境恶劣,自然承载力低下。人们在这里不仅要和風沙抗争,更要与贫困抗争。以治沙带致富,以开发促保护,是近年来人们探索出的一条有效路径。

新疆把治沙与治穷相结合,广泛吸纳民营企业参与,采取“政府主导、企业参与、全民攻坚”的模式,沙区特色经济植物种植面积已达873平方公里,企业93家,年总产值34.5亿元。甘肃灵武县坚持“谁经营、谁投入、谁管护、谁受益”的原则,将国有荒沙地和治沙生态林承包到户、到企业,通过治理经营、发展林下畜禽养殖、种植中药材等方式,拓展新的增收致富渠道。青海探索“谁承包、谁治理、谁开发、谁受益,可继承、可转让、可拍卖,长期不变”的政策,鼓励企业投资治理,调动社会参与积极性。内蒙古推广“企业+基地+合作社+农牧户”的经营模式,打造一批龙头企业,全区年销售收入100万元以上的林沙产业加工企业达274家。

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,中国开始探索沙漠公园建设,目前已开始建设70个国家沙漠公园,总面积3407平方公里。过去被人们视为“沙魔”的地方,如今开展起公共休闲、科学文化、宣传教育活动。人们亲身体验来之不易的治沙成效。

今后,我国将进一步加大依法治沙力度,深化防治沙工作机制改革,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,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防治沙治沙和科技创新,推动防治沙工作取得新的进展。

据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(记者侯雪静、胡璐)土地沙化,被称为“地球癌症”。中国有三分之一的贫困县、三分之一的贫困人口就生活在西北沙区。几十年来,中国在沙化区的斗争中付出了巨大努力,实现了从“沙进人退”到“沙退人进”的重大转变,打造了一座绿色的生命丰碑。

中国治沙,一个世界奇迹

青海三江源地区,被称为“中华水塔”,是全国乃至东亚生态安全屏障。经过多年不懈努力,沙化土地面积从上世纪末年均扩展348平方公里,到现在年均减少114平方公里。“十二五”以来,全省累计防治沙面积4358平方公里。这里是西北地区人们持续不断开展防治沙沙工作的一个缩影。

从当年“风沙逼近北京城”,到绿色屏障不断加固,防治沙取得了历史性的转变。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,全国沙化面积以每年3436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张,到2004年出现缩减以来,连续10年保持净减少,第五次监测期内年均减少1980平方公里。

宁夏是全国唯一一个省级防治沙综合治理示范区。“十二五”期间,全区治沙造林0.27万平方公里,森林覆盖率由“十一五”的11.9%提高到最新的12.63%。形成了“植被恢复与重建—草地畜牧业—节水生态农业”协调发展的综合治沙技术体系,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誉为“中国治沙奇迹”。

在内蒙古,通过全面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、“三北”防护林体系建设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等多项重点生态建设和保护项目,2004年至今已完成林业生态建设面积0.67万平方公里,草原建设2.67万平方公里。

在陕西,沙化面积较2009年减少593平方公里,平均植被覆盖率达60%,较2009年提高

2016年11月3日,天宫二号航天员景海鹏通过视频朗读了一封信。听到身处太空的景海鹏叔叔读出“中宁县宽口井中石油希望学校春蕾女童合唱团”这几个字时,13岁的小姑娘柯原激动地“心都要跳出来了”。

“我们梦想有一天,太空邮局能把我们的歌儿送上太空,那样,我们就可以对着地球上所有的人唱歌儿!……”时至今日,柯原仍然可以几乎一字不差地背诵下信的内容。

正如自己的信有幸被“几十万里挑一”选中一样,柯原觉得,自己也足够幸运,能够搬出大山,走进宽敞明亮的教室、跟着专业的教授学音乐……

改变,从四年前开始。2012年,包括柯原一家在内的海原县1665户家庭,从深山集中搬迁到中宁县宽口井生态移民村。路程很远,大巴车足足开了四五个小时。

从满目千沟万壑的黄土到满眼红艳艳的枸杞园,从曲折的山间小路到平坦的水泥马路,从几间破败的校舍到红墙蓝瓦的宽敞校园,这些变化令人欣喜。

“以前在老家是把雨水、雪水都收集进水窖里,然后用绳子勾住桶把水打出来,烧水、做饭、饮羊都靠它。”柯原说,现在自来水接进了屋里,干净又方便。

干旱缺水,是根植于黄土高原世代人内心的共同记忆,就如同深深嵌在大地上的一眼眼苦水窖。

深山里的农业也是广种薄收。柯原的爷爷柯具山告诉记者,老家有好几十亩地,一直种小麦和胡麻,雨水好的年份每亩地能打100多斤小麦,很多时候只有二三十斤。

宁夏“西海固”,位于黄土高原的干旱地区,年降水量平均300毫米至600毫米,年蒸发量却在1000毫米至2400毫米之间,生态环境极为脆弱,1972年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为最不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。为了破除“越穷越垦,越垦越穷”的恶性循环,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,宁夏在西海固地区先后实施了一系列移民工程,已累计搬出近百万贫困人口。

搬到宽口井后,每户移民家庭都分到了水浇地和养殖棚圈。他们把土地流转给枸杞种植企业,年轻壮劳力外出务工,妇女一般留在家中照顾老人孩子,农忙时在附近地里打工,每天能挣到100元左右。

然而,生态移民的零工,每天能挣到100元左右。然而,生态移民的零工,每天能挣到100元左右。然而,生态移民的零工,每天能挣到100元左右。

“几年前,当一个女学生说要辍学回家结婚时,我震惊了。”宽口井中石油希望学校校长万占文说,如果家长、学生们的思想不转变,建再漂亮的学校又有什么用途呢?

在去过很长一段时间,由于经济欠发达、重男轻女等原因,山区女孩十五六岁就嫁人的现象比较普遍。柯原的妈妈、大姐都是如此。

针对这种现状,万占文并不急着抓成绩,而是从“养成教育”抓起,让这些孩子逐渐培养起学习、生活方面良好的习惯,并通过组建足球、剪纸、绘画、音乐等兴趣小组丰富孩子们的业余爱好。

或许是因为家乡有着唱“花儿”的传统,柯原从小就爱唱歌,也很有音乐天赋,经常对着大山唱,对着牛羊唱。

只是,山很大,声很小,梦很远。柯原告诉记者,搬家前她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外婆家,那里也是一片大山。

2015年7月,宽口井中石油希望学校春蕾女童合唱团正式成立,有了专业的声乐训练,唱歌有了钢琴伴奏,柯原的音乐梦想被点燃。“我一直都在关注山区回族女童这个群体,所以当校长找到我说想要成立合唱团时,我没有犹豫就答应了,因为我觉得音乐可以扶贫、更能够扶志。”就这样,今年已经64岁的北方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教授刘阳生,开始了每周一次往返银川和中宁的义务教育之路。

女孩们不知道,刘教授其实是有雄心的。中国国际合唱节每年都会资助一个来自贫困地区的合唱团。“我想帮这群有梦的孩子登上更大的舞台,让全国甚至全世界人都看到,在中国最贫困的地区,有这样一群爱唱歌、有梦想的女孩。”

千难万难,不负众望。2016年7月,由40名回族女孩组成的“宽口井中石油希望学校春蕾女童合唱团”带着一曲《家乡的枸杞熟了》,登上了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合唱节的舞台。

“当看到介绍这些孩子家庭状况、生活背景的宣传片时,人民大会堂台下很多观众都热泪盈眶。”刘阳生说。

那次是柯原和同学们第一次去北京,演出结束后他们还一起去了天安门、长城。“北京,比我想象中大,更美。”柯原说,她以后想考清华大学,想继续学习音乐,想当节目主持人……

万占文感慨地说,四年来,学校的高中学业率逐渐上升,学生也变活泼了,爱说爱笑了。更重要的是,无论男女女孩,学生的眼界宽了,志气大了。

“十三五”期间,国家将继续实施包括移民搬迁安置在内的扶贫攻坚计划。全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,有易地扶贫搬迁需求的约1000万人,主要分布在深山区、石山区、高寒山区、荒漠化地区,其中,西北荒漠化地区、高寒山区约300万人。

被称为大山西北之魂的民歌“花儿”,还有另外一层寓意——少年。“花儿”的歌声,是少年的梦想和远方。“我是唱花儿的花儿哟,我的花儿唱绿辽阔的黄土大高原,再苦再累都觉得甜……”在阳光明媚的操场上,柯原和的小伙伴们经常唱起这首歌。

(记者赵倩、张亮)新华社银川1月10日电

走出大山唱「花儿」